

工商联

历史
人物传

黄孟复 全哲洙 主编



工商联

历史人物传

黄孟复全哲洙主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商联历史人物传 / 黄孟复, 全哲洙主编. --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58 - 0179 - 7

I. ①工… II. ①黄… III. 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 历史人物 - 列传 IV. ①K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1264 号

工商联历史人物传

主 编: 黄孟复 全哲洙
策划编辑: 李红霞
责任编辑: 李红霞 徐彩霞
封面设计: 开刚设计
责任审读: 肖海林
责任印制: 迈致红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640 千字
印 张: 33.75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8 - 0179 - 7
定 价: 198.00 元

服务热线: 010 - 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 - 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 - 20 层, 100044

http: //www. chgslcbs. cn
E-mail: cicap1202@sina. 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 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 - 58302915

《工商联历史人物传》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黄孟复 全哲洙

执行主编 庄聪生

编辑部成员 林泽炎 赵德江 李 飞 涂 文

黄文夫 寿乐英 张金喜 程依武

何学文 鲁咪咪 尚小琴 林蔚然

梁岩涓 刘琦波 费 勇 郭 蕾

刘佩华 房安文 任传东 林 航

冯东海

序 言

在工商联历史上，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工商界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为发展民族工商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极大的工作热情，参与各地工商联组织的筹建，并成为各级工商联组织的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们团结带领工商界人士投身祖国建设，努力发展经济、活跃市场、稳定物价，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们动员号召私营工商业者参加公私合营，带头执行党的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有的重新回到工商联领导岗位，有的成为工商联领导人，有的重操旧业或二次创业，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如实反映这些工商界代表人物的成长经历和卓越贡献，全国工商联和各省区市工商联怀着对工商联历史人物的敬仰和对工商联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查阅了大量史料档案，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及其亲属，搜集了一批弥足珍贵的照片和文字史料，汇编成《工商联历史人物传》。本书共收录48位颇具影响的工商界历史人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他们的点滴成长瞬间和人生经历。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2010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中发〔2010〕16号），为工商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编辑出版了《工商联历史人物传》，有利于通过宣传和弘扬老一辈工商业者和工商联领导人艰苦创业的历程、爱党爱国的精神，进一步推动中发〔2010〕16号文件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有利于引导和激励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导和激励他们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热心光彩事业、社会公益事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引导和激励他们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努力推动企业科学发展、实现产业报国夙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黄孟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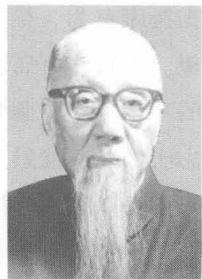
2012年5月

CONTENTS

目录

全国工商联首任主任委员陈叔通	(001)
工商界的楷模胡子昂	(015)
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荣毅仁	(027)
经济改革的破冰者经叔平	(037)
改革开放的“旋风”王光英	(049)
化工巨子李烛尘	(065)
一代传奇巩天民	(077)
从同仁堂走出的副市长乐松生	(093)
肝胆相照邓文钊	(107)
从戎从商、一心向党的典范韩望尘	(115)
纺织大王刘国钧	(121)
爱国爱党的楷模周叔弢	(131)
猪鬃大王古耕虞	(141)
一生奉献给统战工作的华煜卿	(151)
党的挚友张敬礼	(163)
爱国实业家刘靖基	(173)
爱国、奋斗、奉献一生的实业家黄长溪	(183)
“老工商”、“老政协”孙孚凌	(195)
一生执著追求真善美的张绪武	(207)
与党相知、一生相随的女实业家郭秀珍	(219)
工商界的奇葩李宏昌	(235)
渤海之湾的耕耘者朱文渠	(245)
一生献给工商联事业的白铁石	(259)
正直商人覃锡树	(267)
工商联事业的马前卒卢振远	(277)
与党荣辱与共的优秀代表武百祥	(287)

民族毛纺织工业的功臣唐君远	(295)
工商界技术人员的典范孙廷芳	(309)
爱国实业家包达三	(323)
从商办学、报国扬志的企业家汤元炳	(333)
爱党爱国的工商巨擘潘锷鏊	(347)
与党风雨同舟五十载的食品业先驱沈翰卿	(353)
懂技术 善经营 毕生献身纺织事业的苗海南	(361)
平生执著“听、跟、走”的刘志民	(373)
河南新乡现代工业之父王晏卿	(387)
爱国实业家周苍柏	(397)
湖南工商界奇人陈芸田	(409)
披肝沥胆五十秋的桂系元老卢燕南	(425)
琼属归侨楷模林鸿藻	(433)
与党肝胆相照的典范彭劭农	(441)
党的亲密益友李宗坊	(451)
交通运输战线的先锋毛铁桥	(461)
爱国爱民的女“儒商”刘淑清	(473)
肝胆赤诚、紧跟党走模范薛道五	(481)
达观清正王宜之	(487)
青海工商界的旗帜廖霭庭	(497)
回族商界精英李凤藻	(511)
一心一意跟党走的买买提·尼牙孜哈日	(523)
后记	(530)



全国工商联首任主任委员陈叔通

□ 张金喜

陈叔通一生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忧国忧民，苦心探索，终于在晚年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一位晚清翰林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国民主战士，进而成为新中国国家领导人之一。

陈叔通 1876 年 8 月 7 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的一个书香世家，是清朝最后一科的翰林。现在的北京成贤街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走进孔庙的大门，门内左右两侧排列着 198 座高大石碑，记载着元、明、清三代 51624 名进士的题名，其中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的一座碑文上刻有 315 名进士的名字。陈敬第（字叔通）名列第二甲第 38 名。

陈叔通的父亲陈豪，字兰州，号止庵，清同治年优贡，曾任湖北省房县、应城、蕲水、汉川等地的知县，为官清廉，有政声。兄汉第，字仲恕，和他一起在日本留学，工诗画。民国初年，曾一度任总统府秘书和国务院秘书长。袁世凯称帝时，即避居天津，参加反袁运动。袁氏死后，先后担任清史馆提调和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等职。陈豪对其子陈叔通的成长寄予厚望，从小管教严格，平生以荷花“清净天成熟与伦”的高洁品质作为座右铭，勉励其成长进步。

陈叔通幼承家教，对古文词赋造诣很深，12 岁时就熟读《史记》、《资治通鉴》、《文选》等史籍。1902 年，陈叔通时年 26 岁，中举人，次年中进士。由于勤学苦读，渴望功名，又朝考中试，并被授予翰林院编修。陈叔通的这段经历在江南曾一时传为佳话。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陈叔通忧国忧民，开始向往维新运动。1898 年 6 月，光绪下“明定是国”诏书，开始“百日维新”。陈叔通当时感到振奋，



支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运动，认为“维新万口说津津”，国家振兴有望。同时，他痛恨慈禧的专横，怒斥“垂帘听政”为“牝鸡司晨”，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后，陈叔通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曾作诗悼念被杀害的维新志士，尤其推崇“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有“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魁杰，未留身以有代，惜哉”的悼念。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陈叔通忧心如焚。为了寻求兴邦之道，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前往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目睹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势日强，希望中国也能借鉴，同时他也开始接触到了兴中会的革命思想。1906年夏，陈叔通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他以民选议员的身份在清廷资政院任职。他上任后，热心社会的改革，如：在杭州办学，办报纸，提倡妇女解放，特别是反对妇女缠足的恶习。他还是创办杭州女子学校和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他还根据日本法政大学讲义撰写了《政法通论》和《政治学》两书，署名陈敬第，1914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陈叔通在资政院任职期间，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还参加了由梁启超组织的“宪友会”，主张君主立宪政体。但当他看到大小官吏尔虞我诈，昏聩颞顽，没有振作图强的迹象时，他又开始倾向革命党，并和革命党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经常有来往。1903年，陈叔通寄住在北京西珠市口仁钱会馆，陶成章曾先后两次到会馆与陈叔通策划替徐锡麟捐资买爵，以便乘机起义。没想到，陶成章刚从日本回国，消息即被透露出去，陶成章也被陈其美派杀手暗杀。陈叔通惊闻凶讯，曾赋诗悼念，诗曰：“密图买爵荷咨询，珠市匆匆岁转轮。才入国门凶问至，盖棺饮恨目犹瞋。”陈叔通看到革命志士饮恨泉下，痛不欲生，特别是当他回忆起与陶成章之间由一般接触到建立革命情谊的往事时，感慨唏嘘不已。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清帝被迫退位。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当时国内各地政党林立，各政党都想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时年36岁的陈叔通，不仅积极拥护辛亥革命，而且还准备竭尽全力为国事作贡献。首先，他和黄群共同发起，把陶成章生前领导的光复会改组为国民公会。接着，又与籍忠寅领导的共和协进会及黎元洪领导的民社合并为共和党。合并以后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人数大约为200多人，从整体实力上看仍然不能与国民党抗衡。经过袁世凯的亲自策划，共和党又与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民主党和以王揖唐为首的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黎元洪任进步党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为理事，在国会中形成了能与革命党抗衡的格局。

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的力量，有效地抵制了国民党在国会的地位。与此同时，进

步党人也希望通过袁世凯的地位来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但是，当袁世凯通过国会议员的推举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后，马上就开始实行了独裁，把政党视为赘疣，不愿意接受任何政党的约束。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伐袁世凯，起初西南各省的军政要人大多持迟疑或观望态度，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督办江苏军务的冯国璋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瑗是陈叔通的同科翰林，彼此之间交情很深。陈叔通与黄群商量后，由黄群赴南京劝冯国璋内应，并且通过胡嗣瑗得到冯国璋通电讨伐袁世凯的底本。因而各省要人先后响应起义，护国运动也在各地蓬勃兴起。袁世凯死后，陈叔通对国家寄以希望，认为从此可以走向新生。但是，现实却是各省军阀的连年混战、争权夺利，陈叔通陷于“莽莽神州长夜似，问天无语奈愁何”的失望和苦闷之中。

陈叔通亲眼目睹了中国政治舞台上党派纷争、尔虞我诈的局面，深感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正在这时，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菊生（元济）一面来电相邀，一面派人见面，力挽他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原来，早在辛亥革命这一年，张菊生曾邀陈叔通进该馆工作。当时，陈叔通志不在商，没有应邀。民国元年后，陈叔通到北京担任国会议员，对国家前途仍抱有极大希望，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以期施展自己人生的抱负。但是，漫漫长夜，看不到曙光；岁月蹉跎，已使两鬓斑白。正在歧途彷徨的时候，他接到张菊生的邀请，于是决定弃政从商，于1915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作《吾生》一诗：“吾生未半岁蹉跎，鬓发侵寻已渐皤。积悔讵成今日是，纵谈时有少年过。旧书丛里蟬招隐，邻树荫中鸟弄和。莽莽神州长夜似，问天无语奈愁何！”他刚届不惑之年，慨叹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而两鬓渐斑，对以往的政治生涯深感厌倦，甚至产生“积悔”之心。“旧书丛里蟬招隐，邻树荫中鸟弄和”说明他在新的领域里找到了新的追求。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虽已下了弃政从商的决心，但仍难以割舍忧国忧民之心。他苦苦探索，仍不得要领，实在是无可奈何。

当时，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大的一家出版商，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并在中国各重要城市及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组成了庞大的销售网，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却一度危机四伏。在外部市场上，产生了劲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无疑受到了它的强劲挑战。但事实上制约商务印书馆发展的关键问题却是它的内部管理问题。陈叔通进馆以后，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认为症结在于当时商务印书馆所辖的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政出多门，缺乏联系和协调。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冲突，也严重影响了整体事业的发展。有鉴于此，陈叔通认为必须设立一个总机构，把三所的行政、人事、财



务都集中起来，以作全局思考、通盘筹划，只有这样，商务印书馆的业务才能有条不紊，不致互相掣肘而在与中华书局的商战中受挫。因此，他建议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指挥调度三所的总管理处，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全馆行政事务。陈叔通从实际出发，建议成立会议制的总务处，而不是总管理处。总务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个协调制度的名称。它由总经理、经理（副总经理）、印刷所长、实职编译所负责人、实职发行所负责人五人组成，定期叙谈，是为常会。所与所需要协商，是为特别会议。涉及具体小部门，总务处长以记录员身份参加会议，可列席陈述、发言，但无表决权。会议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意见一致，便执行；不一致，下次再协商，直至一致后再进行活动。这使三所之间的联系大为改善。此外，全馆财务、文书等事务，集中属总务处。总之，它是总务处会议的事务部门，但它不能指挥三所。张元济欣然采纳了陈叔通的建议，并请陈叔通拟定组织大纲和各种规章制度。

在陈叔通的辛勤组织和努力下，1916年，总务处正式成立，陈叔通担任总务处处长，负责主持汇总的各项工作。从此，商务印书馆有了统一调度、协调三所的最高决策机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陈叔通在任期内，总务处定期组织召开由总经理、经理、三所所长参加的总务会议，制订业务计划，协调各项工作，商定馆务大事。为了适应业务日益发展的需要，他还逐渐建立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规程，全馆文书档案的建立工作也随即开始，形成了一个科学的集中分层管理体制。

统一的合议制管理机构，使商务印书馆摆脱了旧式的管理，开始向现代新式管理转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各个部门和各个科室之间密切了工作联系，按章办事，循序渐进，从计划、编审、印刷到发行，一环扣一环，避免了脱节现象。这使商务印书馆的出书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叔通进商务印书馆将近一年，袁世凯帝制失败，黎元洪代理大总统，国会复会。1916年8月，陈叔通向商务印书馆请假，赴京参加国会会议。同年6月，国会再度解散。从此，陈叔通终止了议员生涯。1917年3月，陈叔通又回到商务印书馆任职，一直专心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底，陈叔通提请辞职，经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的挽留，又继续任职一年，终于在1921年底离职。之后，陈叔通仍保留商务印书馆的董事职务。在此期间，还一度担任过董事会议长。

陈叔通离开商务印书馆以后，又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工作认真，办事严谨，业务上极有建树，在社会上卓有信誉。这时，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为了拉拢社会上著名人士出来为他们装饰门面，曾不止一次由吴鼎昌等人来“邀请”陈叔通到南京担任要职，均遭拒绝。陈叔通立志不与



官僚政客为伍，对各种官僚的“邀请”一概不予理睬。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如何大泽一羊裘。”他以“有所不为斋”命名寓所，表明自己不愿“附凤攀龙”的心迹。

陈叔通虽然在出版界、金融界先后取得了成就，其经营、组织才能和人品在社会上获得广泛赞誉，但他仍认为，“年年生日同虚度”。特别是在当时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年代里，陈叔通“不堪兵火苦相煎”，感时伤怀，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常使他夜不能寐。为了消愁忘忧，他以赞赏梅花表达自己的节操，此外还寄情山水，足迹踏遍祖国东南、西南各地的名山大川，留下了近百首志游诗，感叹河山壮美，历史沧桑，倾吐忧国忧民的心绪。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此时，陈叔通忧心忡忡，焦虑异常，他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和各种支前活动。但蒋介石强迫 19 路军后撤，结果，淞沪抗战又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面对严酷的现实，陈叔通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他对国民党感到绝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严正呼声使陈叔通认识了共产党，激发了对共产党的敬佩之情，而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极度愤慨，在长诗《卢沟桥行》中，陈叔通愤怒地喊出了“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严厉谴责。

当上海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各界人士的救国会也相继成立。陈叔通虽没有直接参加，但和救国会的领导人常有接触，有的还情谊颇深。他对全国救国会总会“七君子”被捕事件，非常痛心，并为友人及营救“七君子”出狱做了大量工作。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日伪认为陈叔通是清朝翰林，又是日本留学生，企图拉他出任上海维持会会长。陈叔通横眉冷对，坚辞不就。从此，陈叔通对日伪种种诱逼，更加小心应付，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他与友人相约：“相期珍重到晚节。”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捷报传达，七旬老人陈叔通老泪纵横。此时，他在欣喜之余又怀有深深的忧虑，因为他深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独裁统治。当时有友人邀他出来做官，他坚决拒绝，复信说：“第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使陈叔通最不能容忍的是，在经受了八年抗战，备尝颠沛流离之苦以后，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渴望过和平安定的生活，而国民党却把全面内战的灾难强加在人民头上。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他，终于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革命洪流之中。

陈叔通还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组工作，又在原赵主教路（五原

路)大通别墅包达三先生家中,定期举行双周聚餐会,同时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双周聚餐会以聚餐为名,讨论形势,交换意见,不时地请专家学者一起分析研究时事问题。同时,还借聚餐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传达解放战争的消息,对鼓舞大家的斗志,提高思想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年6月23日,由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推动的上海各界和平请愿代表马叙伦、吴耀宗、黄延芳、盛丕华、张同伯、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等进京请愿,在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暴徒袭击,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陈叔通得知血案后,不顾自己高龄去慰问受伤者。他为民主斗争而奔走的精神,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1947年5月,上海学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莫须有”罪名,肆意逮捕了大批无辜学生,引起了上海各界的愤怒抗议。陈叔通闻讯立即联络了九位著名老人,并亲自起草了抗议书,分送国民党当局吴国桢(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市警备司令)、张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强烈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当时社会上盛传的“十老上书”。由于十老的介入和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这一举措,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迫害。

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的“戡乱总动员”,同年10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白色恐怖日甚一日。当时在上海的一部分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与陈叔通有深厚友谊的民主革命斗士马叙伦先生于1947年年底离沪赴港前,劝他也要尽快离开上海,还有许多朋友担心陈叔通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毒手,苦心相劝,但陈叔通始终留在上海,团结一部分进步人士继续进行反蒋斗争。他营救被捕学生并支援进步青年投奔解放区,其中很多是交大、同济的大学生。白色恐怖虽然严重,但陈叔通对于个人安危处之泰然。当时,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以同乡关系写信给陈叔通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勾去。今后你再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陈叔通读信后,满腔义愤,并托人捎口信答复他说:“我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否则将无好下场。”在此期间,陈叔通还经常把上海的反蒋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各种政治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写在秘密信札中,托人带往香港,交给马叙伦先生。在这些秘密信札中,陈叔通还以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经过认真观察和思考,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光明与希望的所在,并预见到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都已为期不远,抒发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对人民解放事业寄予了深切的关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势已去,却又妄图退保长江天险,放出南北分治的空气。曾有一时,“南北朝”之说甚嚣尘上。国民党政府还利用一些文人政客发起所谓的“千人通电”,要求停止战争,恢复和谈,并请陈

叔通签名，陈叔通严词拒绝。他作诗说：“姑息终贻他日患，未除元凶肯投戈？”陈叔通常对人说，步枪加小米的共产党军队能够打败比自己强大几倍、几十倍，以美式飞机坦克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前者深得民心，后者失尽人心。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陈叔通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积极响应。他对新政协的组织程序、议题、组成成员以及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双周聚餐会上，地下党的同志邀请陈叔通到解放区参加会议，共商国家大事，陈叔通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在离沪赴港时，他曾对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说：“你要把银行保护好，并联络同业，为解放军进城后接收工作做好准备。”有人劝陈叔通：“你已年过古稀，向不做官，现在何必冒险远行呢？”陈叔通毅然回答：“七十三前不计年”，生命今日才开始。陈叔通把一生愿望的实现，完全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美好前程充满信心。

1949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陈叔通离开上海到达香港。2月27日，陈叔通与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王云生等一起，搭华中轮离港北上，辗转到了解放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亲切接见，并被征询了对新政协会议的意见。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地点，有人主张在较早解放的石家庄。陈叔通建议：“石家庄是地区性的，以在北平召开为好。”在商谈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号问题时，陈叔通赞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改用公历。陈叔通的卓见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在北上途中，他写下了豪情满怀的诗篇：“迟暮长征两鬓皤，未除元恶肯投戈！画疆王气成狐鼠，夹岸军声乱鸭鹅。姑息终贻他日患，纵谈遥忆故人多。正如夜尽力迎曙，回首中原发浩歌。”陈叔通认为，敌人不会自动放下武器，姑息养奸，终贻后患，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在茫茫长夜已到尽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热烈欢呼胜利曙光的到来。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陈叔通立志要为人民再做一番事业。

上海解放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由北京回到上海，向上海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解放区的见闻，对大家起到了鼓舞作用。并和黄炎培、盛丕华等发起成立上海工商界劳军分会，筹集物资，慰劳解放军。1949年6月15日，陈叔通到北平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筹备会，并担任了筹备会的副主任。他以“万分光荣和万分欣幸”的心情发表讲话，向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在讲话中，他要求各民主阶层、各民主党派诚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加强并巩固民族统一阵线，“给予民族叛徒以及一切反动分子以致命



的打击，并将帝国主义残余势力从中国境内彻底清除”。他还呼吁全国产业界“发挥爱国的创造精神与牺牲精神”，以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来表达对新政协的支持。

1949年9月21日，陈叔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毛主席致开幕词。当陈叔通听到毛主席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充满着自豪、自信的声音时，激动不已，他热烈欢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还积极参与制定了《共同纲领》并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1949年10月1日，在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城楼上，他和张澜、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站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身旁，面对百万豪情沸腾的人们，心潮汹涌，热泪盈眶。陈叔通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可以说是暮年逢盛世，他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余生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人民的事业，于是他挥笔写下了诗句：“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大好前程能到眼，未来盛世共加肩。乐观便是延龄诀，翻笑秦皇妄学仙。”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初期，陈叔通还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他不顾古稀高龄，不辞旅途辛劳，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新中国的成立使陈叔通重新焕发了青春。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陈叔通对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积极拥护。他动员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认购爱国公债，并支持各界人民赴朝鲜慰问。同时，陈叔通代表中国政府，在国内热烈欢迎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欢送大会上，陈叔通非常热情地谈到，今天我们首都各界人民怀着无限热烈和依恋不舍的心情来送别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离开北京返回朝鲜。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访问我国的三个多月期间，不辞辛劳地在我国作了广泛的访问，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作了关于朝鲜情况的许多报告，艺术团作了一百二十九场精彩的表演，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英雄的朝鲜人民在反抗美国侵略的正义战争中所表现的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从而有力地鼓舞了我国人民为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而奋斗的热情，鼓舞了我国人民进一步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朝鲜兄弟民族争取祖国统一和重建和平生活的事业的热情，更加巩固了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陈叔通的致辞，获得了大会经久不息的掌声。由于年事已高，陈叔通当时未能亲赴前线，这一直被他引为一大憾事。

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他怎么也坐不住，也想亲身投入进去。对此事，毛泽东极为关心，为此专门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信中

道：“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这令陈叔通感动不已，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陈叔通到一些地方视察土改情况，有时还住下来体验生活。他还积极支持思想改造运动，并在运动中重新改造和确立了自己的立场观点。陈叔通曾经说过，他过去对人民事业贡献很少，现在一定要补上去。他向党中央表示，“党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会认真去做”。正因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了这种认识，他对党交代的工作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他说：“我同党一心一德，绝不会负虚名而不负实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陈叔通对于党提出的每一个方针政策，总是认真领会，认真贯彻。例如，党提出“火葬”的问题，一般人认为老年人不易接受，但陈叔通第一时间表示坚决拥护，他认为火葬是移风易俗的好办法。

陈叔通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从不知辛劳，经常主持会议，并认真参加有关文件的起草与讨论，还多次代表政协常委会向全体会议作工作报告。他还经常到基层作调查研究，参加座谈。在发言中，他鼓励大家要坚决跟党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陈叔通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诚心诚意地做党的挚友、诤友，他对土改、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问题，对党的整风问题等，都曾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出自己的看法，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贡献。

1951年10月，陈叔通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开始着手筹建工商界全国性组织。1952年6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在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的会员代表大会上，均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的工作，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在工作中，他不顾高龄，宵旰勤劳，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工商界进步人士，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大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段，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向广大工商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失时机地指明应走的道路和方向。他密切联系会员，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学习党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不时向党的领导同志求教。在工商联工作中他尽其全力把党和政府的要求与工商界的愿望融为一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陈叔通殚精竭虑，投入晚年的全部精力，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也受到了工商界同志们的尊敬。当1955年我国对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时期，社会上一般都认为工商界重视定息，而工商界自己也确实有所谓的“坐三望四”之说，即估计国家给工商界的定息是三厘，但希望是四厘。后来国家规定定息是五厘，七年不变，如果还有困难，可以拖一个“尾巴”。这对当时的工商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然而，陈叔通此时最关心的并不是定息



问题，他关心的是公私合营时对私营企业的清产核资能否公平合理；人事安排是否适当；企业合营后公私双方如何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尤其是后两点，他格外关注。事实证明，这几个问题，正是发挥工商界的积极性，使他们有条件贡献自己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术专长，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关键性问题。在工商联工作上，陈叔通一贯主张既要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又要积极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他曾多次主动向党和政府就工商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说，我之所以会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调动工商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为工商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知识、有技术、有管理企业的经验。现在国家要发展生产力，要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去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怎么能吸引他们同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他还说，我们的工作如果“左”了，就会影响工商界积极性的发挥；如果“右”了，又会影响工商界的自我改造。所以，不论“左”了还是“右”了都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归根到底，必然损害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他对全国工商联发出的重要文件和通知，一般都亲自审阅，一丝不苟。他对工商界人士说：“我们要加强学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看清祖国的远大光明前途，认识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暂时利益应服从长远利益。”当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后，他劝导工商界人士要“严格地遵守一切政策法规，从而正确地发挥积极作用，克服消极作用”。

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举行第一届执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会议召开前，毛主席召开座谈会，教导工商界，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陈叔通在会议上及时传达了毛主席的教导，并强调指出：“国家的前途就是我们个人的前途。我们的道路是光明的，是广阔的，工作是做不完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贡献他的力量，为人民服务，都会有他发挥能力的机会。”同时，陈叔通还针对当时工商业者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上的一些模糊认识，指出：“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虽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对于如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体地逐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把资本家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不少工商业者还了解得不清楚或者是有所顾虑的，对于自己的前途如何、命运如何，心中往往七上八下，动荡不安。”陈叔通说，是毛主席的指示使工商业者认识了剥削的本质，认识了祖国的伟大前途，也认识了只有把自己和自己后代的前途寄托在祖国的前途上面，才能走上光明大道，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次会议结束以后，参加会议的各位执委回到当地立即作了传达。工商界广大人士欢欣鼓舞，掀起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段，陈叔通殚精竭虑，向党积极献计献策，并积极向工商界人士宣传阐释党的方针政策。工商界有人回忆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私营工商业者成为国家的公职人员以后，叔老要求各级工商联协助政